

应该承认的是，清朝所指代的“中国”，与中华民国所指代的“中国”，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区别很大。

其次，本文的主旨，是从满族的角度讨论他们对中国的认同问题，选取的则是晚清这个特定时期，在这个特定时期，满人心目中的“中国”与朝廷多少还是重合的，他们对这个中国有着确定无疑的认同，当改良派和革命派众口一词地鼓吹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时候，他们中一些人的反应，是急切地想加入到这个国家中来，甚至不惜附和汉人而认黄帝为祖，但从切身利益考虑，确实也只有保存皇统、鼓吹立宪一途。

总之，对大多数满人来说，清朝的“中国”和清朝被推翻之后的“中国”在他们心目中不可能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从此“中国”到彼“中国”的认同之间的过渡，未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也是曾有过痛苦艰难的选择过程，讨论这个过程，是探讨中国现今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关键的一个方面。

【网络文章】

旗人如何变成“满族”

<https://mp.weixin.qq.com/s/8Mi1-8OsWrBXHwGJUIO5Fg> (2020-12-17)

定宜庄

3月10日下午，著名清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定宜庄教授来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做了题为“旗人如何变成‘满族’？”的讲座。定教授这个题目去年曾在台湾“中研院”的一次读书会上做过报告，相关论文也已经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上。

清朝皇帝的族群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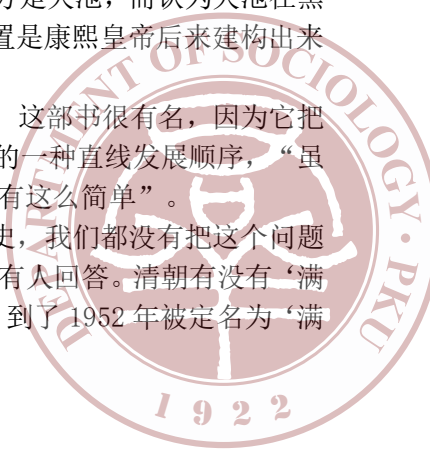
定宜庄坦言她的研究受到一些美国学者的启发，比如以前有学者提出清入关前建立的八旗只是一种非民族性的社会组织，但他们入关后面对不同于他们的庞大汉人群体，才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这才开始有了族群意识。而这种族群意识表现在，比如康熙寻找自己族群的发祥地——天池。

满族人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创世神话——从前有三仙女去天池沐浴，突然天上飞来一只神雀，叼着一颗朱果，这颗朱果落在了老三的身上，老三就把朱果含在嘴中，结果受孕生下他们的第一代始祖猛哥帖木儿，然后才产生了这个民族。但是天池在哪？没有人知道。

直到康熙时期，皇帝才派人去寻找本族群的发祥地，“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了吉林长白山，认为那里就是天池，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学者不承认那个地方是天池，而认为天池在黑龙江以北的某个地方，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定论。所以天池的地理位置是康熙皇帝后来建构出来的，并不是满族人一开始都知道天池在长白山”，定教授说。

接下来，乾隆朝进一步对族群进行建构，出现了《满洲源流考》，这部书很有名，因为它把满族的历史编排成肃慎（先秦）、勿吉（三国）、女真（金）这么下来的一种直线发展顺序，“虽然现在我们（包括教科书）一般都是这样叙述，但真实的历史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旗人如何变成‘满族’？从1949年至今，无论清史还是满族史，我们都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所有的书一讲就是‘满族’，但‘满族’这个词是哪来的？没有人回答。清朝有没有‘满族’二字？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满族’原来就是旗人，到了1952年被定名为‘满族’，成为我国56个民族之一，但这是一种想当然。”定教授说。



“满洲”是族名而非国名

定教授接下来澄清了“满洲”、“旗人”、“旗族”、“满族”等长期被学界和普通公众混用、误用的概念。

“满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不尽相同，事实上清代并无“满族”之称，只有“满洲”与“八旗”，两者的意思既有重合，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满洲”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在以前，我们都把“满洲”理解为族号，例如我国满族史的权威读物《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中如此写道：

1636年皇太极去汗号，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前一年，他并定族名为满洲，废除了诸申（女真）旧号。族名、国名的改称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方面，统一后的女真各部需要有一个新的族名……另一方面，多民族的辽东联合政权已不是“金”的国号所能概括。从此，“满洲”、“清”的名称正式沿用下来。

但定宜庄认为“满洲”并不是族名，而应该是国名，“清”则是王朝名，类似唐、宋、明一样。“我现在奇怪的是，我们这么多研究者，竟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我都害怕会不会搞错。但‘满洲’这个词就是这么出现的。”

因为清太宗皇太极曾经清楚地说过：“我国建号满洲。”这里“满洲”指的是国号而不是族号，这句话的满文原文为 *ereqi julesi yaya niyalma muse guruni da manju sere gebu be hvla*（汉文译作：此后所有人等称我国原有之名满洲），“*gurun*”就是满语“国”的意思。“然而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的前辈学者都没有很好地研究。”

那么清代满人的“族”指的是什么？当然不会是近代才出现的“民族”概念，而是指氏族（*hala*）。满洲作为国号，到底包括哪些人？比如美国的一些学者，就认为满人等同于“八旗满洲”（八旗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人），但定宜庄认为这是不对的，她在研究中发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这本书特别关键。

这本书是乾隆九年钦定的，全书收录了1114个姓氏（*hala*），这些姓氏就是由官方钦定的“满洲”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满洲的主体和核心，这里面不仅有满洲姓氏，还有蒙古姓氏（如博尔济吉特氏）和汉族姓氏，不全是满洲姓氏。从此，上至清朝皇帝，下至普通百姓，凡说“满洲”或者“满人”，指的就是爱新觉罗皇室以及这些被纳入《通谱》姓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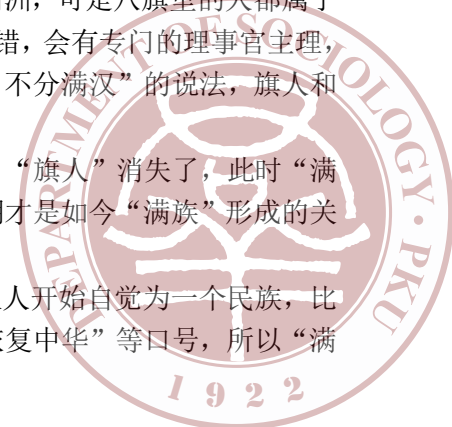
“旗人”、“旗族”和“满族”

众所周知，清朝从努尔哈赤开始建立起八旗制度，把所有归附于他的人都纳入到这个组织。无论满人还是蒙古人，他们都有一种观念，即认为只有人多才是力量强大的象征，而不像汉人把占有土地看得很重要。

清朝入关后，所有人被分成两种户籍，一种是旗籍，一种是民籍。因此清代的人分两种，旗人和民人，除了旗人以外，其余全是民人。“八旗里的人并不全是满洲，可是八旗里的人都属于旗人，旗人都享受特权，在法律上和汉人是不平等的，比如他们犯了错，会有专门的理事官主理，跟汉人的刑罚都不一样。”所以晚清时在京城还流传有“只问旗民，不分满汉”的说法，旗人和民人的界限比满与汉的界限更严格。

从1911年到1949年，清帝国灭亡，民国建立，八旗制度解体，“旗人”消失了，此时“满族”作为一个群体，面临着解构与再生的过程。定宜庄认为这一时期才是如今“满族”形成的关键时期。

近代以来，西方的“民族”、“民族国家”等概念传入中国，汉人开始自觉为一个民族，比如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建构自己的发展，于是才有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所以“满



族”最早是由革命党人先叫起来的。“我们看当时大量的文章，他们管这些人不叫旗人也不叫满洲，而叫满族。在那时，革命党人相对于自身作为汉族而建构了满族，当然他们为了‘驱逐鞑虏’，给满族脸上抹了好多黑。”

那么满人怎么称呼自己？清朝统治 300 多年，他们作为八旗这个整体，其实不愿意被拆散，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都一样，很难再分开了，所以他们就创造出一个词叫“旗族”，表达了八旗人对于“满族”的认同。

辛亥革命后，清帝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拟定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和《优待皇室条件》。其中一条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这使得“旗族”一度很流行。但到 1924 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故宫，八旗彻底解体，“旗族”这个词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存在时间很短。“后来爱新觉罗·溥儒（溥心畲）很积极地为满族正名，但事情没做完就去了台湾。”

随后到了 195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协，虽然请了一两个皇族到政协当代表，可是政协最早没有满族，当时好多满族人就很伤心，于是山东青州（当时叫益都）、新疆伊犁地区的一些满族就向周恩来上书说，希望承认满族。周恩来年轻时在辽宁铁岭读书，接触过好多满族人，能够理解这些人的想法，后来就说应该承认有满族这个少数民族，同时国务院不断发文件，例如《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承认满族的历史功绩，保护满族人民的情感，增进民族团结。

因此，可以说 1950 年以后，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民族识别工作下，“满族”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但它的人员组成、经济文化与认同意识都和原先的清代满洲不同，比如清代的满族主要生活在内地特别是北京，而现在的满族主要生活在东北三省。其次，清代的满族是都市民族，主要生活在城市（很多城市都有“满城”），而现在的满族主要在农村，“此满族非彼满族”。

【论 文】

“新清史”的源与流¹

孙 江²

“新清史”兴起于美国，到底属于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还是属于阿尔泰研究（Altaic Studies），鲜有人追究。如果“新清史”属于前者，堪称“旁枝”，这是何炳棣（Ping-ti Ho）在与罗友枝（Evelyn S. Rawski）辩论中占据上风的原因。如果将“新清史”归为后者，则似为“末流”，因为“新清史”代表人物的身份是汉学家，研究的主题与阿尔泰学者差异甚大。

“新清史”自称与以往的清史研究不同，关注清统治的“满洲性”——族群性（ethnicity），重视使用满文史料。所谓“满洲性”既是显示清统治性格的标志，也是理解其“汉化”的关键要素，强调前者不能改变后者的实在性。如果仅用满文史料就能建构一部大清史的话，早在一百年前就有日本学者做了，何待今日的美国学者？然而，当“新清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引起的反响既大且久，反过来促使其在美国成为热点。关于“新清史”的轮廓，已有很多论著言及，本文在此仅截取关乎其源与流的一个断面——日本因素，思考“新清史”所引发的一些问题。

¹ 本文由送逸炜根据孙江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录音整理，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钟焯主编《新史学》（第 13 卷）：历史的统一性和多元性》，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² 作者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学衡研究院院长。